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的驱动： 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石晶 崔丽娟**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采用问卷法(研究一)和实验法(研究二)探讨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心理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2)内在责任感中介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3)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是联接群体效能与内在责任感的桥梁(中介变量)。

关键词 集体行动 群体愤怒 群体效能 内在责任感 自我效能感

1 问题提出

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是指内群体成员为改变群体的劣势状况,维护或提升群体的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统一行动(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任何社会都有集体行动,某些历史条件下,集体行动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有些条件下,集体行动则有可能成为和谐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尽管大部分群体成员对群体问题都能够达成共识,甚至对采用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群体问题表示赞同,但真正参与其中的却很少。因此集体行动的驱动机制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Van Zomeren & Iyer, 2009)。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集体行动发生、发展及其变化的规律,从而发挥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的驱动作用,以及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虽然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理论解释和模型构建上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成果,但关于集体行动的中介机制和调节机制的研究还比较有限(Duncan & Stewart, 2007; Giguère & Lalonde, 2010)。本研究关注的是为什么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的驱动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平行的?是什么因素将两者联系起来共同推动集体行动的发生?

1.1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和 Leach (2004)提出集体行动受情绪聚焦路径(emotion-focused coping)和问题聚焦路径(problem-focused coping)

的共同驱动(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0; 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2;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10)。情绪聚焦路径认为,由于群体成员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主观上产生了不公正感,为了抒发由此带来的消极情绪(如愤怒),人们会选择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Leach, Iyer, & Pedersen, 2006; Pennekamp, Doosje, Zebel, & Fischer, 2007; Stürmer & Simon, 2009; Van Zomeren et al., 2004)。群体愤怒指群体成员在对群体问题进行认知评价后而产生的愤怒的情绪体验(Van Zomeren et al., 2004)。当群体的愤怒情绪被激发后,群体成员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更强烈(Miller, Cronin, Garcia, & Branscombe, 2009),而如果愤怒情绪通过其他方式得以宣泄,则成员们的参与意愿明显减少(Mummendey, Kessler, Klink, & Mielke, 1999)。目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群体愤怒与集体行动呈显著正相关(Grant & Brown, 1995; Leonard, Moons, Mackie, & Smith, 2011; Smith, Cronin, & Kessler, 2008; Van Zomeren et al., 2004)。问题聚焦路径认为,当内群体成员认为某问题是集体性的,且集体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集体的利益时(Van Zomeren & Iyer, 2009),群体效能感是预测集体行动的重要变量(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4)。群体效能感指群体成员认为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可以达成群体目标的信念(Klandermans, 1997; 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4)。当群体成员相信群体拥有足够的资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1YJA190001)和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382)的资助。

** 通讯作者:崔丽娟。E-mail: ljcu@psy.ecnu.edu.cn

源应对集体行动的需求,并且大家团结起来可以取得预期的结果时,才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Hornsey, Blackwood, Louis, Fielding, Favor, Morton et al., 2006; 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8)。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是从群体情绪和工具理性的视角出发,是将主观视角(心理性的)和社会视角(工具性的)联系起来,来共同解释集体行动的产生机制的。

假设 1: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1.2 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责任感是促使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Miller, 2006)。以往研究表明,社会组织认同之所以对集体行动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是因为社会认同激发了个体想成为一个“好成员”的心理,这种心理使得个体认为自己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内在责任感(Stürmer, Simon, Loewy, & Jörger, 2003)。

受此启发,我们认为内在责任感在群体愤怒、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也起到中介作用。首先,群体愤怒是由不公平的群体问题引发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会把群体成员彼此之间联系得更紧密(Livingstone, Spears, Manstead, Bruder, & Shepherd, 2011),而对于群体成员来说,群体关系越密切,帮助其他群体成员或参与相关活动的责任感就越强烈(Burnette & Forsyth, 2008)。

假设 2a: 内在责任感在群体愤怒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虽然群体效能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影响集体行动的,但充足的群体资源和社会支持也会提升群体成员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依据趋近/抑制理论,具有高能力感的人更容易是竞争行为的发起者;此外,当遭遇外群体威胁时,高能力感的人会唤起一种强烈的群体责任感(Mead & Maner 2012)。因此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可能成为联接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的桥梁,从而影响集体行动意愿。

假设 2b: 内在责任感在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3: 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中介群体效能对内在责任感的影响。

1.3 本研究概述

为了检验以上假设,采用问卷研究(研究 1)和实验研究(研究 2)相结合的方法,探讨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并深入探索群体情绪和工具理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因果内涵。进一

步考察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研究 1 和研究 2),以及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连接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中起到的桥梁作用(研究二)。模型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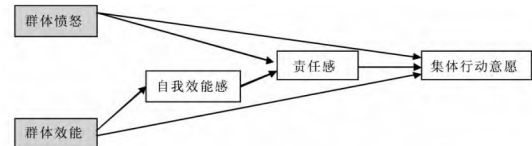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2 研究 1: 问卷研究

2.1 研究目的

以“为保证冬季宿舍用电安全,学校实行限电”为集体行动的研究背景,虚构了学校后勤管理部门将实行冬季限电的决定。通过问卷研究的方法,检验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在责任感的中介效应机制。

2.2 研究方法

2.2.1 被试

被试为来自某所大学的本科生。共发放问卷 2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165 份,有效回收率 82.5%。其中男性 17 人($M = 19.25$, $SD = .856$),占 10.3%,女性 148 人($M = 19.28$, $SD = 1.148$),占 89.7%。

2.2.2 研究工具

群体愤怒: 根据 Van Zomeren 等(2004)研究中的群体愤怒问卷进行修订,共包括 3 个题目,用于测量被试对冬季宿舍限电这一群体问题的情绪体验,例如“后勤管理部门对学生宿舍进行冬季限电的决定让我气愤。”($\alpha = .781$)

群体效能感: 根据 Van Zomeren, Leach 和 Spears (2010)中的群体效能问卷进行修订,共包括 6 个项目,用于测量被试对所属群体能够解决冬季限电这一群体问题的能力的感知,例如“我认为我们学生联合起来可以让学校更加重视学生的用电需求。”($\alpha = .833$)

内在责任感: 根据 Stürmer 和 Simon (2009)的内在责任感问卷进行修订。共包括 2 个项目,用于测量被试是否认为自己有责任参与集体行动,例如“我觉得我有责任和大家一起抗议后勤管理部门冬季限电的决定。”($\alpha = .777$)

集体行动意愿: 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0)结合本研究中群体问题的特点进行

编制,共包含4个项目。例如“我愿意在抗议书上签名,抗议后勤管理部门冬季限电的决定。”($\alpha = .881$)

以上问卷均采用Likert 7点计分方式,从1代表完全不同意,到7代表完全同意。

由于根据问卷得到的是个体层面的数据,而本研究要测量的变量(群体愤怒、群体效能感和集体行动意愿)均为群体层面的建构,因此需要评价群体成员反应的内部一致性程度。本研究采用群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Rwg 结果表明群体愤怒、群体效能感和集体行动意愿的 Rwg 值分别为 .819、.922、.845,均大于 .70,说明群体成员反应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

进一步为了检验四个问卷的结构效度,使用 Amos 7.0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从数据分析的拟合指数来看($\chi^2/df = 1.880$, $NFI = .904$, $GFI = .883$, $CFI = .952$, $RMSEA = .073$),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进一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Delta df = 15$, $\Delta \chi^2$

$= 41.121$, $\alpha > .001$,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可以认为测量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2.3 结果与讨论

预分析表明群体愤怒($t = -1.2$, $p = .232$)、群体效能($t = -1.45$, $p = .149$)、内在责任感($t = -.31$, $p = .757$)和集体行动意愿($t = -.77$, $p = .443$)的性别差异均不显著,因此在后续的分析中不考虑性别因素的影响。

2.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群体愤怒、群体效能与内在责任感及集体行动意愿的相关均显著,这些结果为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以及中介效应的检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同时由于群体愤怒、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的相关显著,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表1 研究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1 群体愤怒	13.83	4.01	1		
2 群体效能	28.68	5.97	.391**	1	
3 内在责任感	10.18	2.51	.460**	.330**	1
4 集体行动意愿	16.83	5.83	.587**	.549**	.603**

注: * $p < .05$, ** $p < .01$ 。

2.3.2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 内在责任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内在责任感对群体愤怒、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Baron & Kenny, 1986)。结果表明,群体愤怒($\beta = .439$, $t = 7.027$, $p < .001$)、群体效能($\beta = .378$, $t = 6.049$, $p < .001$)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预测作用;群体愤怒($\beta = .391$, $t = 5.253$, $p < .001$)、群体效能($\beta = .176$, $t = 2.369$, $p = .019$)对内在责任感的预测作用也显著。当群体愤怒、群体效能与内在责任感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群体愤怒($\beta = .300$, $t = 4.889$, $p < .001$)、群体效能($\beta = .320$, $t = 5.536$, $p < .001$)和内在责任感($\beta = .357$, $t = 5.936$, $p < .001$)对集体行动意愿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其中,内在责任感在群体愤怒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142,占总效应的 32.3%;在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064,占总效应的 16.9%。以上结果表明,内在责任感部分中介群体愤怒、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

研究1的结果表明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均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集体行动受群体情绪和工具理性的共同的驱动(Van Zomeren et al., 2004)。群体的愤怒情绪越高涨,群体成员对群体应对问题的能力越自信,则群体成员越愿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来。进一步探讨了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都可以通过提升群体成员参与集体行动及解决群体问题的内在责任感,来间接影响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从研究结果来看,不仅群体情绪可以提升群体成员应对群体问题的内在责任感,对群体资源及能力的工具性分析也可以增强群体成员的内在责任感。

然而研究一是针对特定的群体问题在特定情境下进行的研究,也就无法说明其所阐明的心理过程是否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境或者其他类型的群体问题之中。而且其相关研究的本质不能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研究二将从不同的群体问题入手,运用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直接操纵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来检验情绪和工具理性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以及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并进一

步探讨自我效能感在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期对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之间的联接机制提供实证解释。

3 研究2: 实验研究

3.1 研究目的

以高校食堂卫生安全问题为研究背景,采用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直接操纵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检验两者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及内在责任感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以上研究来解释内在责任感的中介效应机制。

3.2 研究方法

3.2.1 被试

来自某所大学的121名本科生参与了本实验,其中男性31人($M = 19.81, SD = 1.352$),占25.62%;女性90人($M = 19.58, SD = 1.218$),占74.38%,被试此前均未参与过类似实验。

3.2.2 实验设计

采用2群体愤怒(有 vs. 无) × 2群体效能(高 vs. 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让被试阅读文本的方式操纵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将被试随机分入四种实验情境之一。

3.2.3 实验程序

实验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变量文本启动部分,第二部分为因变量测量部分。

实验开始前,首先请被试安静坐好,稍事休息后,请被试填答一份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前面背景介绍即自变量启动部分。

群体愤怒情境下呈现的阅读材料表明被试所在学校食堂的食品卫生安全状况令人堪忧,并列举了一些事例;而非群体愤怒情境下的材料表明被试所在学校食堂的食品卫生安全状况较好,同样列举了一些事例。

高群体效能情境下呈现的阅读材料表明群体成员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是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特别是针对学校这类教育行政机构,并列举了其他学校的学生通过集体行动成功应对食堂卫生安全问题的实例;而低群体效能情境下的材料则表明很多问题即使群体成员团结起来,也很难得到解决,并列举了学校食堂的卫生安全问题,虽然每年都是学生代表大会的必然议题,但却是学生生活管理中的顽疾,难以彻底解决。

所有被试在阅读完成“调查背景”后,马上开始填答问卷(包含检验操纵是否有效的问卷和因变量问卷)。

被试填答问卷后,主试将向被试进行解释,说明之前阅读的信息是为了进行一项心理学研究而虚拟的情境,以消除被试的顾虑。

3.2.4 因变量研究工具

群体愤怒操纵有效性问卷由3个项目组成,例如“学校对食堂卫生安全的监管力度让我气愤。”($\alpha = .915$)

群体效能操纵有效性问卷由4个项目组成,例如“我认为我们学生联合起来可以让食堂更加重视食品卫生和安全。”($\alpha = .796$)。

内在责任感:根据Stürmer & Simon(2009)的内在责任感问卷进行修订。共包括2个项目,例如“我觉得我有责任参与一些有利于改善学校食堂卫生安全状况的活动。”($\alpha = .741$)

自我效能感:共包括3个项目,用于测量被试应对该群体问题的特殊自我效能感,例如“如果我付出足够的努力,我相信我能为改善学校食堂的卫生安全状况做出自己的贡献。”($\alpha = .821$)

集体行动意愿:在参考以往研究的基础上(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Leach, & Spears, 2010)并结合本研究中群体问题的特点进行编制,共包含3个项目,例如“我愿意在抗议书上签名,抗议学校对食堂卫生监管不力。”($\alpha = .822$)

以上问卷均采用7点评分,从1代表极其不同意,到7代表极其同意。

研究二同样检验群体成员反应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Rwg ,结果表明群体愤怒、群体效能感和集体行动意愿的 Rwg 值分别为 .816、.897、.804,均大于 .70,说明群体成员反应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

进一步为了在统计上区分研究中的5个问卷,使用Amos 7.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检验问卷的区分效度。从数据分析的拟合指数来看($\chi^2/df = 1.775, NFI = .848, GFI = .871, CFI = .925, RMSEA = .080$),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进一步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Delta df = 15, \Delta \chi^2 = 26.65, \alpha > .01$,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可以认为测量中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3.3 结果与讨论

研究2各实验条件下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研究二各实验条件下问卷得分的均值(标准差)

	群体愤怒组		非群体愤怒组	
	高群体效能组 (<i>n</i> = 27)	低群体效能组 (<i>n</i> = 33)	高群体效能组 (<i>n</i> = 31)	低群体效能组 (<i>n</i> = 30)
群体愤怒	14.15(4.10)	13.67(4.10)	9.35(3.66)	9.00(3.46)
群体效能	24.67(2.59)	21.15(4.53)	23.23(2.97)	21.20(4.30)
集体行动意愿	15.85(3.61)	14.06(3.88)	12.48(5.04)	10.77(4.13)
内在责任感	12.00(1.36)	11.18(1.81)	11.23(1.84)	10.70(1.39)
自我效能感	14.96(3.37)	12.18(4.01)	13.65(3.76)	13.53(3.44)

3.3.1 操纵有效性检验

以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操纵为自变量,分别以群体愤怒感和群体效能感问卷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愤怒操纵对群体愤怒的主效应显著($F(1,117) = 45.692, p < .001, \eta^2 = .281$),群体效能操纵对群体愤怒的主效应不显著($F(1,117) = .008, p = .928$),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117) = .357, p = .551$),即被试在群体愤怒情境下的愤怒程度显著高于非群体愤怒情境下(如表2所示);群体效能操纵对群体效能感的主效应显著($F(1,117) = 16.55, p < .001, \eta^2 = .124$),群体愤怒操纵对群体效能感的主效应不显著($F(1,117) = 1.045, p = .309$),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F(1,117) = 1.196, p = .276$),即被试在高群体效能情境下知觉到的群体效能显著高于低群体效能情境下(如表2所示)。以上结果说明本实验的自变量操纵是有效的。

3.3.2 群体效能与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内在责任感的中介模型检验

以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操纵为自变量,分别以集体行动意愿和内在责任感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群体愤怒($F(1,117) = 18.784, p < .001, \eta^2 = .138$)和群体效能($F(1,117) = 5.213, p = .024, \eta^2 = .043$)对集体行动意愿的主效应均显著,但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1,117) = .002, p = .962$ 。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假设1,即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以两条独立的路径预测集体行动。群体愤怒($F(1,117) = 4.470, p = .037, \eta^2 = .037$)和群体效能($F(1,117) = 5.118, p = .026, \eta^2 = .042$)对内在责任感的主效应均显著,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1,117) = .242, p = .624$,为进一步验证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提供了基础。

使用 AMOS17.0 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建立内在

责任感的部分中介预测模型,以检验群体效能、群体愤怒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驱动机制,以及内在责任感的中介效应。其中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为实验操纵变量(有无愤怒组分别编码为1和0,高低效能组分别编码为1和0),其他变量通过问卷测量得到。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预测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理想, $\chi^2(1,13) = .408, p = .523, CFI = 1.000, NFI = .990, RMSEA = .000$,而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的路径系数不显著, $\beta = .136, p = .094$ 。去掉不显著的路径形成模型二(如图2所示),模型二的拟合情况也比较理想, $\chi^2(2,12) = 3.178, p = .204$ 。并且,其他拟合指数也表明数据拟合情况较好($CFI = .967, NFI = .924, RMSEA = .070$)。这些结果表明,我们模型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和数据的原始矩阵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因此选择路径相对简洁的模型二。

从结构方程建模的数据拟合结果来看,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内在责任感的预测作用均显著,内在责任感部分中介群体愤怒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中介效应值为.058,占总效应的16.2%),并且完全中介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中介效应值为.0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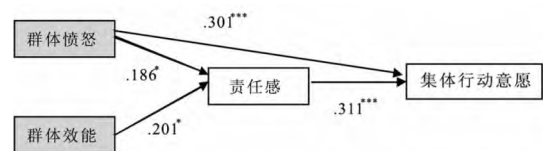


图2 内在责任感中介效应模型

注:模型中的数值均为标准化的路径系数,

* $p < .05$, ** $p < .01$, *** $p < .001$ 。

3.3.3 群体效能与内在责任感的桥梁: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检验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中提出的,应对群体问题的特殊自我效能感是连接群体效能与内在责任感的桥

梁,使用 Amos 17.0 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在图 2 所示的模型基础上增加自我效能感变量,建立预测模型(如图 3 所示),即自我效能感在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预测模型的数据拟合情况比较好 $\chi^2(5, 15) = 8.774$, $p = .118$, $CFI = .927$, $NFI = .857$, $RMSEA = .07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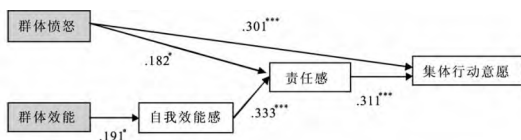


图 3 应对群体问题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模型中的数值均为标准化的路径系数,* $p < .05$,** $p < .01$,*** $p < .001$ 。

进一步对比其他两个可能模型,模型 2(增加群体效能与内部责任感之间的路径),模型 3(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增加群体愤怒与自我效能感之间的路径)。结果表明,模型 2 中新增加的路径系数($\beta = .142$, $p = .094$)及模型 3 中新增加的路径系数($\beta = -.01$, $p = .912$)均不显著,进一步进行拟合指数的比较,模型 2($\chi^2(4, 16) = 6.007$, $p = .199$, $CFI = .961$, $NFI = .902$, $RMSEA = .065$)及模型 3($\chi^2(3, 17) = 5.995$, $p = .112$, $CFI = .942$, $NFI = .902$, $RMSEA = .091$)与预测模型的拟合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因此选择路径较少的相对简洁的模型(预测模型)。

从图 3 可见,群体效能对自我效能感的预测作用显著,自我效能感完全中介群体效能对内在责任感的影响(中介效应值为 .064),假设 3 得到验证。

4 总讨论

问卷研究(研究 1)和实验研究(研究 2)的结果表明,在不同群体问题情境下,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都可以通过提高群体成员的内在责任感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并且研究 2 进一步验证了不仅群体情绪会激发群体成员的内在责任感,群体效能也可以通过提升群体成员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来增强其内在责任感,从而更愿意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

4.1 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

研究 1 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得到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的相关指标,表明群体愤怒、群体效能均与集体行动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但是仍然不能很好地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研究 2 通过文本启动

的方式,直接操纵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来检验两者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以两条独立的路径预测集体行动,两者对集体行动意愿的预测作用并不是互相干扰的,而是相互平行的,群体成员在群体愤怒和高群体效能情境下最愿意参与集体行动。这一结果也有力地说明了集体行动情绪聚焦的应对路径和问题聚焦的应对路径的有效性(Giguère & Lalonde, 2010; 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Van Zomeren, Spears, & Leach, 2008)。

4.2 内在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对内疚感的作用机制检验是本研究的特色之处。假设内在责任感同时中介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的影响,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研究 1)和实验操纵基础上的结构方程建模(研究 2)均验证了研究的假设。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以及集体行动意愿是否强烈也属于一种决策,而群体愤怒作为感性因素,群体效能作为理性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应该是互相限制,而非互相促进的,那是什么因素使得群体情绪和工具理性共同促进集体行动?本研究认为是内在责任感将两者有机联系起来。群体愤怒是从情感上增强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心理联结,从而增强其内在责任感;而群体效能是从能力和资源角度,增强了个体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让个体对自己的能力更自信。而高权力感和高能力感会唤起个体更强烈的群体责任感(Mead & Maner, 2012),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帮助群体或其他群体成员,所以更愿意参与集体行动来改变群体的不利状况。

5 结论

(1) 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对集体行动意愿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2) 内在责任感在群体愤怒、群体效能与集体行动意愿之间起中介效应的作用。

(3) 应对群体问题的自我效能感在群体效能和内在责任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 -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 – 1182.
- Burnette, J. L., & Forsyth, D. R. (2008). “I didn’t do it.” Responsibility biases in open and closed groups.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3), 210 – 222.
- Duncan, L. E., & Stewart, A. J. (2007). Personal political salience: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ac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8(2), 143 – 166.
- Giguère, B., & Lalonde, R. N. (2010). Why do students strike? Direct and indirect determina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Psychology*, 31(2), 227 – 247.
- Grant, P. R., & Brown, R. (1995). From ethnocentrism to collective protest: Responses to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reats to social identity.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58, 195 – 211.
- Hornsey, M., Blackwood, L., Louis, W., Fielding, K., Favor, K., Morton, T., et al. (2006). Why do people engage in collective action? Revisiting the role of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6, 1701 – 1722.
- Leach, C. W., Iyer, A., & Pedersen, A. (2006). Anger and guilt about in-group advantage explain the willingness for political ac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1232 – 1245.
- Leonard, D. J., Moons, W. G., Mackie, D. M., & Smith, E. R. (2011). We’re mad as hell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Anger self-stereotyping and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4, 99 – 111.
- Livingstone, A. G., Spears, R., Manstead, A. S., Bruder, M., & Shepherd, L. (2011). We feel, therefore we are: Emotion as a basis for self-categorization and social action. *Emotion*, 11(4), 754 – 67.
- Mead, N. L., & Maner, J. K. (2012). On keeping your enemies close: Powerful leaders seek proximity to ingroup power threa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2, 576 – 591.
- Miller, D. A., Cronin, T., Garcia, A. L., & Branscombe, N. R. (2009). The relative impact of anger and efficacy on collective action is affected by feelings of fear.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2, 445 – 462.
- Miller, K. (2006). Social obligation as reason for action. *Cognitive Systems Research*, 7, 273 – 285.
- Mummendey, A., Kessler, T., Klink, A., & Mielke, R. (1999).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negative social identity: Predictions b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229 – 245.
- Pennekamp, S. F., Doosje, B., Zebel, S., & Fischer, A. H. (2007). The past and the pending: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group-based anger in historically and currently disadvantaged group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0, 41 – 55.
- Smith, H. J., Cronin, T., & Kessler, T. (2008). Anger, fear, or sadness: Faculty members’ emotional reactions to collective pay disadvantage. *Political Psychology*, 29, 221 – 246.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9). Path ways to collective protest: Calculation, identification or emo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group-based anger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681 – 705.
- Stürmer, S., Simon, B., Loewy, M., & Jörger, H. (2003).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fat acceptance move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6, 71 – 82.
-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2). Protesters as “passionate economists”: A dynamic dual pathway model of approach coping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6(2), 180 – 199.
- Van Zomeren, M., Leach, C. W., & Spears, R. (2010). Does group efficacy increase group identification? Resolving their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6, 1055 – 1060.
- Van Zomeren, M., & Iyer, A. (2009).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dynamics of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645 – 660.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08).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 504 – 535.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 – 664.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10).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dual pathway model of coping with the climate cri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39 – 346.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 Leach, C. W. (2008).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action: Does relevance of group identity influence how people cope with collective disadvantag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7, 353 – 372.
-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994 – 1003.

Driving Effect of Group – 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on Collective Action: Mediating Role of Inner Obligation

Shi Jing , Cui Lijuan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psychological antecedents of collective action , via which individuals act on behalf of their group to challenge disadvantage or injustice (Wright , Taylor , & Moghaddam , 1990) , has been the target of the focused research for decades (van Zomeren & Iyer , 2009) .

The dual path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Van Zomeren et al. , 2004) is composed of emotion – focused coping and problem – focused coping. This model suggests that group memb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collective problems and group efficacy are two independent causality paths which promote collective action (Van Zomeren et al. , 2004; Van Zomeren , Spears , & Leach , 2008; Van Zomeren , Leach , & Spears , 2010; Van Zomeren , Spears , & Leach , 2010; Van Zomeren , Leach , & Spears , 2012) , and together with subjective perspective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perspective (structural) , they can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Based on the dual path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a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up – based anger , group efficacy and inner obligation.

Two studies were concluded in the research. In Study 1 , using electricity restriction in winter as the background of collective action , the approach adopted in this research was questionnaire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 the valid samples were 165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influences of group – based anger , group efficacy on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were investigated. In addition , the mediator effects of inner obligation on the links between group – based anger , group efficac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were explored.

In Study 2 , using food safety issue in universities as the background of group disadvantage , participants wer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n = 121$) . By manipulating group – 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manipulations , and it showed that the manipulations were successful. In addition , using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this experiment investigat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up – based anger , group efficacy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inner obligation. Finally , the experiment investigate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 efficacy between group efficacy and inner obligation , using the method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Group – 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s , i. e. , collective action can be driven by group – 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independently. Both processes exerted additive effects rather than mutual inhibitive effects o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That is to say , in the situation of group anger and high group efficacy , group members' intentions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were most intensive , which was proved in our study. (2) The effects of group – 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on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 were mediated by inner obligation. That is to say , inner obligation links group – based emotions and instrumental reasons together to drive collective action. (3) Group efficacy and inner obligation was mediated by self – efficacy , i. e. , self – efficacy was a bridge linking group efficacy and internal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cope with group disadvantages.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 group – based anger , group efficacy , inner obligation , self efficacy